

滑国璋◎著

几十年风雨路

尝尽人生百味 沥血告白亲情 友情 爱情

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独白

远方出版社

滑国璋◎著

七九河开

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七九河开 / 滑国璋著. —呼和浩特: 远方出版社, 2007.1
ISBN 7-80723-192-0

I. 七… II. 滑… III. 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63606 号

七 九 河 开

著 者	滑国璋
统 筹	陈莎莎
责任编辑	张 宇 敖登格日乐 刘向武 张 旭
装帧设计	晓 乔 王 博
出版发行	远方出版社
社 址	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(电话 0471-4919981 邮编 010010)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市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20 毫米 × 980 毫米 1/16
印 张	17
字 数	200 千
版 次	2007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5 000 册
书 号	ISBN 7-80723-192-0
本册定价	24.00 元



目 录

第一章	东 楼.....	1
第二章	空中楼	27
第三章	楼上楼.....	87
第四章	冷星楼.....	121
第五章	方外楼.....	181
第六章	来雁楼.....	257



第一章

东楼

一九四三年七月某一天,一个男孩出生了。

好像那一刻并没有红日冉冉升起于东方,以及“祥云绕宅”“云里笙歌嘹亮”之类的吉相,后来也没听母亲说起什么“明月入怀”之类的征兆,这显然注定了——一个凡夫俗子。父亲凭他的麻衣相与批八字的看家本领认真地推算了一气,知道这孩子命里并无大富大贵,却也无大灾大难,既找不出逢凶化吉、遇难呈祥的年龄段,也没发现时来运转、平步青云的鸿运流年。

卦上有两个字是确定的:“穷儒”而已。

我带着这个印记走完了一辈子,也没弄清这两个字究竟是好话还是赖话。但这预测的准确性我是打心里折服的。

朱家坎

那是个战事频仍民不聊生的年代。我出生的那年遇上天津发大水。天津百货大楼的楼基上至今保存着当年的水高印记。二十五岁的父亲与乡下来的母亲带着我和我姐求生来到北大荒,在黑龙江省龙江县一个叫朱家坎的小镇上住下来。在那个地方,靠算命是养不活家口的,而且我又得了两个妹妹。父亲在车站脚行干了一段苦力,坚持不住了,有人出主意让他生豆芽菜,于是就在家里垒起了能流水的水泥槽台,一排大缸坐落在上边,我们每天就在充满水气霉气味的屋子里睡觉了。生豆芽菜温度是最重要的,低了不长芽,高了烂根儿。经常听他们一掀缸盖惊叫一声,我知道一缸豆芽完了。若干年后,我在《祭母文》中写道“叫卖长街,一声声谋生不易;夙兴夜寐,一日日劳瘁艰辛”,就是说这段生活。

在成为建筑工人的儿子之前,我不记得父亲有过什么正式的职业。父亲活着的时候,我们很少能坐下来像跟母亲似的拉拉家常说说旧事,现在想问也没处问了。我从父亲的笔记本中发现了一篇个人简历,才算给我提供了一些想象的依据。我父亲一九一七年七月九日出生于天津刘庄,然后在天津私立第十八赵氏小学读书,高小毕业;曾在天津县教育局主办的乡村师范读书、毕业;上世纪三十年代,在天津裕丰纱厂原动部看特滨(发电机,因出事故被解雇),在天津协和印刷株式会社学印刷;做过流动工人,曾在拍卖行司账,因该行停业而解雇。四十年代,天津水灾后粮价一天三涨,无法维持,在东北龙江县搬运站做工。后来在龙江县自生自卖豆芽菜。

“买豆芽喽——”父亲推着小车在街上边走边叫卖着。这声音一直在



我的脑海里回荡着,若干年后与一部台湾影片《搭错车》里的“酒干倘卖无”的声音交融在一起,两个父亲的形象也融为一体,我弄不清哪个声音更让人辛酸!

父亲虽是乡师毕业,那年头已算得上是个文化人了。他的字写得挺好,端正秀气,又读过些四书五经,懂得礼义君臣父子之类的道理,开始在家里教我读书习字。那时的幼学启蒙读物无非是《百家姓》、《三字经》、《千字文》。教书的办法一个是认字,一个是死背。劝学的方法很简单:打手板。那情景,我大妹至今还能绘声绘色地描摹出来。她说:

我记得爸爸坐在椅子上,你站在他面前背书。妈妈在炕上缝衣服,姐姐坐在旁边看,我趴在炕上听你背书。你背了几句就卡壳了,两只手紧张地藏身后。爸爸脸色变了,厉声道:“伸出手来!”只见爸爸拿来一块长条式的木板(样子很像古装戏里当官用的奏板),抽打着你的手,一下、两下、三下……妈妈放下针线把你拉过来,爸爸急了,从妈妈的怀中把你抢过来,四下、五下、六下……一直打到二十下。“明天再考,记住了吗?”爸爸余怒未消。“记住了。”你抽噎着回答。爸爸看见你那种起来的小手,也许是有点心疼吧,为了缓和气氛,顺手拿了一本没有封面的小人书,“听着,我给你们念小人书。老和尚,吃大鱼,没有老婆养儿子……”这时候,妈妈和姐姐便笑了起来。

我也记得有这么一本小人书。它应当算是我有生以来读的第一本小人书。书名忘了,内容是一个苦孩子被庙里一个和尚收养,乡里的孩子们追随在他身后,起哄地喊着那首一点也不和辙的童谣。老和尚养儿子究竟有什么好笑,我当时一点都不明白。后来才知道出家人戒色,戒色的人怎么会出来儿子呢?所以可笑。这本小人书在我们的童年里不啻是沙漠里的灵泉、冰峰上的雪莲、悬崖上的七色花,给枯索的童心带来一缕鲜活与清新。它讲的是有情众生的故事,我们因此知道了人生的苦难,还有慰藉苦难的仁慈善良。有了前者,我们的痛苦不再孤独,有了后者,也就有了生活的希望和意义。这本小人书肯定不是我家买的,我们不可能有闲钱花在这上。惟其如此,这本小人书在记忆里显得很珍贵。

父亲是严厉的,而母亲总是仁慈的。父亲上午出去卖菜,检查学业是他

回来以后的事情,所以每天上午我还能找到相对的自由。有一次玩得过头了,把父亲布置的段落忘到脑后,想到检查的严酷不寒而栗,急中生智,拿纸条抄了下来,贴到炕上饭桌腿的侧面。考问开始了,我照着纸条往下念。机警的孩子终究斗不过机警的大人,小把戏被父亲戳穿了。一个耳光扇过来,我的头磕在了桌角上。妈妈听见我的哭声很异常,抱起来一看,眼里出血了。妈妈发疯似的把书撕了,喊道:“不念了,不念了!”爸爸也害怕了,任凭着从没有脾气的妈妈发火。母亲是儿子最可靠的守护神,在她的怀里,创痛都会给人带来甜丝丝的感觉。

我是个构不成故事的平庸孩子,从小就没显示出什么不同于人的超凡之处。“没坐过监牢的人是个不完整的人”,这是名人名言。十八世纪法国作家让·卢梭就是个自知与众不同的人,他说“大自然塑造了我,然后把模子打碎了”,不可能再有第二个卢梭了。而我呢,我只是上帝批量生产中捎带出的一个粗糙制品,“它不经意地塑造了我,然后把我忘了。”

我的家庭也属于批量生产中的一个,既不至于饿死,也永远没富裕起来。

我的故乡天津在摧城拔池的炮火中解放了。一九五三年三月,平庸的父亲带着平庸的孩子们搬回了老家。

老婶与老姑

还乡,是件快乐的事。对孩子们来说并不知道它的真实价值,只是新鲜。有变化的生活总是令人兴奋的。其实天津没什么值得我们牵挂的,我们跟这里没有关系。对长辈来说就不同了,他们在这里长大,这里有他们的记忆,有亲人和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,虽然这些关系不可能给他们什么帮助。

父亲先把我们安置在下瓦房。我爷爷在这里开一家木材货栈。虽说叔叔是后奶奶生的,而爷爷却是亲的。他们收留了我们。

父亲不可能立刻找上工作。他白天做临时工,晚上在天津培华会计学校上学,转年考入天津市建设工程管理局干部训练班,两个月后结业,分配到天津市第三建筑公司第五工程队财务组工作。他有文化,会作文,会写字,会

算账,打得一手好算盘,又受过专门培训,应当说可以做一个称职的“干部”了。可是微薄的工资养活不了这么一大家子,他毅然提出下组干活。劳累的工人要比轻松的会计工资高。经领导批准,他到了油工组,由劳心者转化为劳力者,并由此确定了他的一生。

那一年我九岁,已经记事了。由于血缘关系,我的父母亲说过不少他们的后娘后弟的是非,但就我的感觉来说,他们并没有达到可以称作恶劣的程度。

叔叔年轻,长得很帅,我婶自然称得上美太太了。尤其是跟我老姑(后奶奶生的)坐在一起,显得老姑太憨而婶婶更美了。老姑在这个家是很有身份的,有亲爸亲妈亲弟撑腰,在我妈我婶面前又是不便惹的小姑子,自然是有恃无恐、怎么说话都行。老姑的性格很开朗,大大咧咧没什么毛病,跟她挺好处。她是个乐天派、新潮女性。她拿出一张黑白照片,照片上是一位绅士与一位新娘的结婚照,她指着其中的新娘问:“这是谁?”

“这不是我婶吗!”我的眼力不差。

“好小子。这是谁?”她指了指那位新郎。

我审视良久,答不上来。但肯定不是我叔叔。那是谁呢?我婶怎么跟另一个男子照过这种照片,并且这种照片怎么能出现在这个家庭里呢?结过婚或有过外遇的证据也不该拿给小辈来看呀!看看眼下四周的气氛,也不像家里发生了什么事件,我的确被弄懵了。

“小子,猜不出来吧。”老姑卖着关子,颇有几分得意,用指头指着自己的鼻尖说:“是你老姑我!”

我这才恍然大悟,并且思路一换,茅塞顿开,确实是老姑,女扮男妆的老姑。

我爷爷当然不参加这种乐子。不过,他能让我老姑照这种照片,也够开通了,而且老姑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确实让人感到又亲切又可爱。

她不在我爷爷这儿住,她有自己家了,她是因为我们来了才到这儿逗留上一半天。

“嘿!”她总是对她哥直呼其名,“晚上上我们家吃包子去。”

“麻馅的?”

“油唆子的。”油唆子是肥肉耗油的渣滓。

“不去。油唆子也请客，穷不起啦？”

“哟嗬——还请不动！”老姑鄙夷不屑地斜了他一眼，“你要是天天吃上油唆子，烧高香吧！”

玩笑归玩笑，情况却属实。生豆芽菜的刚回老家，还不知到哪儿想辙呢！

老姑乐乐呵呵的生活真让人羡慕，爷爷的威严居然在她身上无效。而父亲的微笑却从来没给我们带来过轻松。我原先把我的不幸归咎为封建家长专制，但老姑的家长不是明摆着比我的家长更封建吗？

从没见过老姑忧愁，她嫁的老姑夫也不是什么阔主儿。性格也能给人带来欢乐幸福，这倒是个很能开悟人的真谛，可惜我却没这个福分。

可能是因为婶婶的美丽，我竟连她的孩子都喜欢。她的孩子又干净又漂亮，比老姑的孩子小一半岁，在一起玩的时候我总是向着小的，这态度被老姑看出来来了。

“小人儿不大，倒能分出里外了。”

我当时真没听懂这句话的含义。到如今才弄明白，里是指娘家，外是指外姓。天哪，我那时若是这么聪明，早出息喽！

老姑一来，就到书摊上租二十本小人书，够她看一两天的。穿个大裤衩子坐在马扎上，或躺在帆布躺椅上，看得很投入，并不关心她蹲着和躺着的姿势。这时我也能跟着沾光，不花钱就能看上小人书。可惜我看书太慢，总须一个字一个字地读，嘴里不出声，心里却是在念。我一直不会浏览，不甘于知其大意而休焉，我认为那是极大的浪费。文学是欣赏，语言之美就在字里行间，若是只为弄懂故事，何必读书呢？这个不好的习气让我在一生吃了大亏，听某人说一个假期读了几十本书，简直是天文数字，我看过的书其实没有几本。因为看书慢，每次在老姑还书的时候都叹憾不已。

“谁让你磨蹭来着，”老姑说：“拿来，我换回来新的你再看。”那些没来得及看的小人书里真有好的，眼睁睁地被老姑抱走了。就算是换回来的还让看，可刚才已经看过封面的那几本肯定不会再有了，这一别也许就是永别。

九岁的孩子尝到了哀伤。

数十年后,我们长大了,老姑也老喽!每次去天津,除了看望亲三姑之外,都愿意到老姑家坐坐。老姑老喽,胖得圆轱轮墩,坐在小马扎上喘不过气来,爱抽战斗牌香烟,是原先的烟斗牌在“文革”中适应革命形势改的牌子。老姑让我去买,我嫌它才两毛钱一盒,就好心地买了一盒飞马。她说:“让你买战斗的就买战斗的,这(指着我买的烟)么软,不解渴,懂吗?”我赶紧陪上笑,点头哈腰:“我去换,我这就去换。”

“得了,对付着冒烟吧。”

老姑哪能真让我没完没了地跑腿呢,我都多大啦!

围堤道拆迁改造了。老姑家那座有正房与西房、有葡萄架与花、有水泥地面的小庭院怕也不存在了,该是搬进高楼上住了吧。

但老姑与老姑夫都已过世多年。我想再看看那张老照片再逗逗老姑,已不可能了。

婶婶很端庄,端庄得像一个概念,说话声音不高,话也不多,很平淡,不生动。穿一身旗袍,圆圆的胳膊从手腕一直到肩头。烫发头被一个月牙型的宽宽的发卡拢在肩后,修长的颈项在旗袍圪挞袷高领的包裹下显得又精神又风韵,从旗袍侧摆的开衩处不时地闪动一下白腿。这在这个家族群体中算得上是一道风景了。夏天太热,人们睡不着就坐在院子里的小凳上乘凉闲聊,一人手里一把大蒲扇,只有奶奶拿一把诸葛亮的羽毛扇,很像是唱戏人的手里的道具。我发现叔叔的孩子不在了,便去南房他们住的屋子找他。我不敢喊,生人加上小辈,我岂敢造次,便扒在窗户上看看那个孩子在不在屋。我惊呆了,婶婶坐在小板凳上正抬起大腿擦脚,另一只脚放在盆里,而大腿却完整地呈露着。

我慌乱地离开了,不声不响地回到人群中,既不说我要找的那孩子在,也没说那孩子不在。

关于旗袍这一服装样式,我几乎赞美了一生。即使后来生出的美轮美奂的奇装异服怎样刻意地暴露,刻意地追求妖冶与性感,我认为没一件式样能抵得上中国旗袍的完美。

我不记得我婶跟我说过话。几年后我爷爷死的时候,她哭成了泪人儿,嗓子都哑了,她把我叫到屋外说:“你去给我买斤槽子糕去。”她一整天没吃东西,身子都软了。我觉得她怪可怜的,很愿意替她做点什么。后来我跟妈妈说我婶的嗓子都哭哑了,妈妈说:“嗨,那是装的。”我才明白做媳妇真不容易,也明白了妯娌是这么种关系。

我婶在这个家族中做了个合格的媳妇,少言寡语,喜怒不形于色,虽然并不亲切,可也挑不出大毛病,对我们家不可能有真挚的亲情,却也不像后奶奶那么明白地不怀好意。

老 屋

大沽路是纵贯天津南北的一条长路,虽然并不笔直,却绵延十数里。上世纪九十年代,我带着竺青寻访故里时,在门垛的墙上居然辨出刻在我童年脑海里的四个大字:海记大院。

一九五二年夏,我们在下瓦房爷爷家完成了过渡性的小住,搬进了这里。

听大人说,我们这海记大院一带叫东楼。天津市有东楼、西楼、南楼、北楼,好像还有西南楼。这些地名,我从小就耳熟能详,只会称呼,却不知它所指的是哪座楼,并且这片地方简直就没有楼。即使临街的买卖人家有个小二层,大约也不会以之命名的。

肯定指的是古建筑,就像每个老城都有钟楼、鼓楼一样,钟鼓楼的地名依旧,而实物早被湮灭了。

海记大院原先是个什么买卖,余未查其详。我们住进去的时候,这是一个车马大店。院子很大,前院停满了骡马大车,左侧是一排车馆过夜的小屋和喂牲口的马槽,地上零乱地撒着草料和散碎的豆饼。大院里横七竖八地摊着胶轮大车,大车旁或立或卧的大马悠闲地甩着尾巴,驱赶着追随它们鞍前马后的苍蝇。地面被马尿或雨水弄得一片泥泞,里院的人要绕过这些牲口才能走到东南角的土墙后面去上茅房。

一道挺长的土墙把里外院隔开了。土墙开了个门,走进去是一溜连成一体的小平房,住着以最低廉价格租用的贫困居民。我家住在北数第三间。

我一直不明白,爷爷是开木材店的业主,我家为啥连个正经住处都没有呢?

家族的是是非非我所知甚少。这时候,女人细心的优势就显得格外重要了。大妹妹比我小两岁,许多事比我记得还清楚,加上她后来常去天津,跟亲戚们走动得比我密切,很多事被她补充上了。她的补充不但让我知道了我家的故宅确实在H庄,还知道爸爸何以房无一间,何以举家谋生东北,以及亲族间芥蒂之由来。

妹妹说:一九六九年回天津,老姑带她去了老家H庄,告诉说这一片房子都是咱们家的。看到一座具有清朝年间北京四合院式的房子,老姑告诉我:“这一间是我住的,那一间是你爸爸住的,这两间是你爸爸结婚住的,这一间是生你姐住的,后边的院子是你爷爷奶奶住的。”老姑不厌其烦地诉说过去的故事。

妹妹看见那高大的青砖瓦房,百思不得其解:“咱家既然有那么多房子,为什么让我们流落街头呢?如果分给我们一间房子,我们也不会去远走他乡。”老姑不假思索地说:“宝贝儿,这得问你爸爸去,谁让他向我妈妈飞大茶壶的?跟我妈对打对骂,你爷爷用皮带狠狠地抽了他一顿,把他赶出家门了。”

没有任何传奇色彩,一个寻常继母与继子的平凡故事,就决定了我家的命运。

一九八九年夏,爸爸带我去趟H庄,让我认一认祖屋。宽敞的庭院共有六个,每个院的门前都有一个牌楼。牌楼上没有字,是空着的,据说是老太爷想让他的儿子们考上举人或成名后再添上。遗憾的是这几个儿子没有一个成名,所以至今仍然空着。

有一个大门是虚掩着的,爸爸轻轻地把门推开。院子很像乾隆年间京都民院,院内有十几间房子,每间房屋的门窗都是经过精心雕刻的,有花鸟云纹之类的图案。院内有一个天井,天井下面用碎石子和断砖砌成的小花池,池内有火焰般的串红,五颜六色的蝴蝶花。院子的东侧有一颗夹竹桃,枝叶纷披成一棵可观的树。

爸爸告诉我那间坐北朝南的房子是他和我妈住过的。我蹑手蹑脚地走到屋前,隔着玻璃向屋内窥视,屋里没有“现代化”的东西,古色古香的旧式家具摆得井井有条。无意间,我抬起眼看见右墙上挂着一副油画,画里面是一个多彩而富有质感的年轻女性,用略带夸张的手捧着一本玫瑰红色的书,眼神迷离,书的名字我看不清。虽然我不懂画,但我感觉这画作者的功底是不错的,也许他就是这房子的主人,是我家族的后裔?

房子的主人不在,院内静悄悄的。我看见那一间间高大的青砖瓦房,如今已换了新的主人,此时的我,头昏沉沉的,心一阵痉挛。这就是我们的祖屋吗?眼前纵横交错地出现父母带着我们背景离乡的情景,与这个宁静的庭院叠印在一起,二胡《江河水》的音乐隐约地在耳边响起,我禁不住一阵唏嘘……

一九九二年夏,我再次去H庄。又是爸爸带我去的。他好像知道这片房子要拆迁,而且消息十分准确,特意赶来向它做一次诀别。

爸爸起了个早,穿上身浅灰色的夏装,手里拄着苏州产的竹制拐杖。我们沿着柏油马路向H庄走去。它渐渐地出现在眼前,路边的广告牌下围满了看热闹的人群。房产开发商已把小区的规划图高高地挂在广告牌上,房屋的结构,周边的环境,绿化面积,吸引着不少过往行人。当人们正在高谈阔论时,一辆辆带有履带板的推土机徐徐开进来,半导体喇叭里传出来嘈杂的指挥声,随着重型推土机的隆隆声,我家族的大宅门轰然倒下。

站在路边的爸爸,老泪纵横的脸变得扭曲了,浑身打颤,目光茫然地扫了大宅门最后一眼,此时的爸爸像一个缺氧的患者大口大口吸着带泥土味的空气,“这世道真厉害呀,弄得天翻地覆。这么多房子,这么大的平台,转眼间就没了。家没了。日暮乡关何处是啊!”

“这原本就不是我们的家。我们上无片瓦,下无寸土。这里马上就要盖新楼了。不管是老屋还是新楼,都跟我们没有关系。爸爸您说是吧,啊?”我努力克制自己,不让眼泪掉下来。

烈日以赤橙的火焰烧着这堆残砖碎瓦,我搀着爸爸,沿着那条老路走去。

三 姨

三姨是我妈的亲妹妹。

她不是嫁到城里来的,是不堪恶夫恶婆的凌虐从家里跑出来的。进城后把她的女儿托付给亲戚,到处撞头找活干。她吃的苦三天三夜讲不完。想过自杀,又怕丢下孩子没人管。幸好遇到一个钉鞋的,为人老实本分,经人一劝就结婚了。又生了三个女儿,一个儿子。

从没见过钉鞋的三姨夫生气。他每天提上工具箱、铁脚脖子到院门口一蹲,不声不响地干他的营生。有的活还得拿回家干,三姨和我妈一样,成了带孩子做饭的。

三姨是个爽快的有血性的人,什么讲究什么毛病都没有,吃就吃做就做,有啥是啥,从不会拐弯抹角那一套。那时候的人越穷越能生,她家五个我家六个孩子,靠一个劳力挣钱,日子就可想而知了。带孩子如同放羊,能活你就活吧。表妹肋下曾有个疖子,化脓流水儿,一直长不住,妈妈说能看见里边喘气就动。二十年后再见时,她已嫁人生子,在医院当护士,疮口早已完好,人还胖了呢。

穷人命大,真不可思议。

“实在没辙,卖血去,”三姨发狠说:“得了钱先好好吃它一顿,解解馋。我这么胖,抽点血不算什么。”

“瞎扯,”妈妈说:“一顿营养能把那些血补回来?就你会算账?”

“那天我去四虎家,从门缝一看,就小五一个人在屋,趴在炕上脸朝里正数钱呢。全是大票。”三姨放低了声音,“我真想拿个麻袋把脸一蒙,进去一把抓过来。反正家里没人,谁知道谁抢的!”

“过过嘴瘾吧!”妈妈知道是说着玩。

旧社会过来的女人,再怎么也摆脱不了旧观念的束缚,自从有了儿子以后,三姨算是有了主心骨,儿子成了她生命的寄托。要是儿子有个好歹,三姨活着的勇气也就没了。后来听说三姨真的卖过血,真的大吃过几顿。她是个活了今天再说明天的人,有男人般的爽快,有豪杰般的刚强。她是个胖子,其实身体并不好,总是咳咋的吐痰,夜里睡觉也不预备个痰盂,闭着眼啪的一



口,头都不歪,吐到脚底的墙上,挂得滴里荡当的真难看。她不管这些,怎么自在怎么活呗!

再后来,三姨夫死了,三姨也搬到了南楼平房里,仍然是一间屋。闺女们都出嫁了,只有她和儿子过日子。我们家的孩子们无论谁出差赴津,总是住到三姨家,因为她又亲切又随便。爱吃什么做什么,想坐着想躺着都行,三姨从不挑礼儿。

三姨大病的时候,我和妹妹正巧在天津碰上。

“唉,这事闹的,从医院出来,没几天又闹了个二进宫,又住进去一次。”三姨到这时候还想把病情描绘得轻松些,别给孩子们增加压力。

三姨家的儿子已经是卡车司机了,而且有了对象,这让人心里踏实多了。他买回火腿肠和熟肉,陪我喝酒。三姨说我是写书的,让我给她写部传记,把她这辈子受的罪好好写一写。我又不忍拂她的意,就认真地听她讲着。

讲得很细。她在老家怎么呆不下去的,怎么半夜跑出来的,怎么投靠无着,在哪干了多少天,人家又怎么不要的,下雨那天是怎么想死又没死成的……我知道我不可能给她出书,只是听着,叹息着。我若是知道这是诀别,我至少也应该拿笔认真地记下来呀。到了我有能力写书的时候,她经历的情景却写不出来了。这是我一辈子最遗憾的一件事。

第二天我们按计划离开了她。

回家后接到表妹的信,说她妈妈已经去世。

一算日子,就是我走的当天下午。

三 姑

可能是我们自小跟三姨住一个大院,可能是我们的恋母情结导致的特别看重娘家亲,所有的孩子都跟三姨好,跟三姨亲。直到我们离开天津,长大了,每次赴津,仍然奔着三姨家,在她那儿吃住。

三姑知道了,徒步到三姨家,拉我们去她家住,孩子们犹犹豫豫的,三姑着急了,动情地说:“姨家能住姑家不能住呀?姨近呐姑近呐?”醍醐灌顶,我们这才明白点事理:对了,姑姑与我们同姓。



爸爸为这事跟妈妈动火：“孩子都让你拉过去了，六亲不认呐！”又拿我们撒气：“你们对得起你姑吗？良心，人得讲良心呐！”我从爸爸的笔记本里翻见过他写的一首藏头诗，七言八句，每句开头的一字连起来是：“想我妹滑某某受气。”

爸爸不是个感情细腻的人，三姑却在他心目中占有这么重要的位置，爸爸肯定是欠了姑姑很大的人情，因为没法补报，才让愧疚在心头压了一辈子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我家穷得揭不开锅的时候，三姑背着婆婆把她刚当媳妇时的金戒指给我爸拿到当铺里当了，解了燃眉之急，却再没有能力赎回，成了死当。让三姑怎么向人家交待？

开始懂事的孩子们开始去看望三姑了。三姑家在挂甲寺的一个平房小院，是老房子。一进院门有一个影壁墙，拐过来对正的正房是三姑家，左侧好像住着姑姥姥，是姑夫的母亲吧，岁数着实不小了。我去的时候总被安置到东厢的一个小炕上，很整齐优雅而安静，小屋与三姑、姑夫的大屋是一体的。院子里用青砖铺的地面已被几代人磨损了，却很整洁，有一颗无花果点缀在院落里，调节了一下庭院的几何线条，并且摇曳生姿地带来一些活泼俏丽。

三姑像是受了某种委托、带着某种使命似的，不动声色地要帮助我们去接通各种族亲的关系。

“今天去你二姑家！”三姑说。

“二姑是谁？”

“是你爸的堂姐。”

.....

就这样，亲戚关系解冻了，是是非非的旧账过去就过去了。亲戚就是亲戚嘛！

三姑恪守着传统，完成着一种道义的高尚。她老人家提上头一天就准备好的礼品，在酷暑天带着我，走很远的路去探亲。三姑一辈子没胖过，看她走路的辛苦样子，我心里很不好受。

“把背心脱下来，我给你洗洗。”

回来时，我累得中暑了，三姑竟然还有精神干活。